

论八十年代以来文学 世俗化思潮的演化

樊 星

内容提要 本文从时代文化的角度回顾了二十年来世纪末文学的世俗化思潮在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发生演变的进程,勾勒出 80 年代初和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世俗化文学的不同景观,认为从明朗到阴暗、从温馨到鄙俗的主题演变,是当代世俗化进程逐渐“鄙俗化”的一个缩影。

世俗化:一个“长时段”的时代主题

在研究 20 世纪末的文学思潮时,我们很容易想到那些不断更迭的概念——“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家文学”、“寻根文学”、“新潮文学”、“新写实文学”……这些概念的层出不穷是当代文学充满活力的重要标志。不过,如果将那些思潮的更迭仅仅看作是一个不断除旧布新的进程,也许就会忽略在新潮迭起、风云变幻的深处相对恒定的时代精神。依照法国“新史学”的理论,历史研究可以分为巨变的“短时段”、“周期间的中等时段”和“缓慢变动的长时段”,而对于心态史的研究则显然是“长时段”研究的优势,因为群体心态的变化常常是“传统的情性的领地”^①。以这样的观点来看“文革”结束后二十多年来的世纪末文学思潮,我们也可以透过那些此起彼伏的“新潮”发现一些始终贯穿着世纪末文学进程的相对稳定的时代主题,并由此探索时代精神在巨变中又有所不变、作家心态在浮躁中又有所执着的文化奥妙。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走上了现代化建设之路。历史已经证明:现代化之路就是世俗化之路。在西方,“世俗化”是与“宗教化”相对立的一个词。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以来的一部现代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性不断挣脱宗教束缚的历史。而在中国,“世俗化”则是与“政治化”相对立的一个词。至少从明清之际的人性复苏到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再到“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个性解放、90 年代的商业大潮,“世俗化”的声音一直都是与反对封建主义“理学”、批判僵化的“礼教”、远离“斗私批修”的政治梦想这些文化目标联系在一起。主张思想解放的人们看够了“以礼杀人”的悲剧,才从老百姓的世俗欲望与活法中发现了人性、人欲存在的合理性。他们呼唤个性解放、民族富强,有时是设想以刚健不挠的精神去“改造国民性”(例如鲁迅),有时则干脆面对现实,提倡“发财主义”(例如孙中山^②)。应该说,这两种思路都共同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果说,“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情怀,那么,以“发财主义”为代表的民本

主义则体现了中国普通百姓的世俗要求。这种世俗化的思潮在战争年代和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当然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这个世纪末,饱尝了激进主义之苦的中国人才以空前的热情和规模进入了现代化——世俗化的跑道。这样,世俗化便成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制约着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的时代主导精神,并或隐或显地贯穿于80至90年代文学思潮的流变过程之中。

其实,世纪末文学的许多思潮都可以在“文革”中找到源头,世俗化思潮亦然。早在“文革”中,就产生了“信仰危机”的虚无主义情绪。狂热的“造神运动”并没能解决亿万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在短暂的狂热过后,人们开始“重新寻找生存的峰顶”。在许多知青的回忆录中,都记载了从狂热经过失望转向务实的情感旅程。应该说,这样的转变过程为新时期世俗化思潮的高涨奠定了相当深厚的心理基础。当那些独立思考的青年在孤独中探索“合理的利己主义”的伦理观时^③,他们也许不曾料到:在1980年的人生意义大讨论中,“合理的利己主义”会成为许多青年认同的“新”伦理观。这种伦理观后来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下,会发展、裂变出十分壮观的思想文化现象。而当代作家,则以其特有的敏感真实记录了这一心态巨变的进程……

80年代初:世俗化作为一股思想潜流

经历过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一段历史的人们,谁能忘记思想解冻带来的巨大欣喜!90年代的思想界,“怀念80年代”的议论已经时有所闻。那时没有“改革的艰难”的叹息,有的是对现代化的浪漫畅想。那时也有“信仰危机”的阴影,但没有通货膨胀,没有“下岗”,因此也就没有“生存危机”的恐慌。因此,思想界、文学界才那么热闹,许多学者的话题也可以在社会上引起热烈的争鸣,许

多文学作品都引发了波及社会的“轰动效应”。那时,人们的精神面貌真可谓意气风发。那段时间充满了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诗意。

但即使是这样,世俗化的主题还是悄悄浮现了——

一方面,韩少功的《回声》、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蒋濮的《水泡子》、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这些“反思文学”不断追问:“阿Q的子孙为什么绵绵不绝?”呼唤着“新启蒙”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在汪曾祺的《受戒》、陆文夫的《美食家》那样的“市井文学”中,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这样的“改革家文学”,王安忆的《流逝》、《69届初中生》、孔捷生的《普通女工》、张承志的《绿夜》那样的“知青文学”和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万隆的《我的光》、阿城的《棋王》、《孩子王》这样的“寻根文学”作品中,“欣赏世俗”、“理解世俗”、“坚持世俗立场”的主题则展示了“老百姓自有他们的活法,他们甚至可能比思想家、政治家活得更快活、更聪明、更自在”的人生主题。显然,在这样的主题中,有着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题迥然不同的思路。

汪曾祺是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方兴未艾的1980年发表了继承沈从文遗风的《受戒》的。这篇小说追忆了充满乐趣的童年生活,并以清新的笔触展现了乡间和尚自得其乐的世俗生活。无意讴歌修行的崇高,有心表现和尚的人情,作家因此写活了自然的人性。当年,沈从文忧患于现代社会“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其实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官功能都有点麻木不仁”的事实,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生,是古希腊的自然人性^④。显然,这是与鲁迅等人按照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改造国民性”的思路颇不一样的另一种思路。沈

从文的思路,是“返朴归真”的思路。他的主张既体现了西方古希腊文化(而不是西方的现代化)的影响,也足以使人联想到启蒙思想家卢梭赞美“纯朴的灵魂”、呼唤“回归自然”、批判文明使人堕落的浪漫主义思想(由此可见,返朴归真的“复古”思想也是启蒙思想的组成部分),还是中国传统道家“道法自然”、“不物于物”的人生哲学的延伸。在暴风骤雨的革命年代里,沈从文的这种主张自然难以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到了追赶现代化的和平年代里,沈从文的人生与审美理想却拨动了当代人的心弦。“沈从文热”在80年代初的风靡一时不仅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家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之外开辟出浪漫主义文学的新路,而且对于“市井文学”、“寻根文学”的兴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和汪曾祺的“高邮系列”中,“返朴归真”的浪漫主义主题是与对乡民自在人生的欣赏这一世俗化的主题水乳交融的。

陆文夫的《美食家》本来也是“反思文学”的收获。作家“从中国人没饭吃时就惨了的角度来写”,本意在告诫国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⑤,但当他在小说中写出了“为人民”的“大众菜”却使人民怨声载道,倒是“寄生虫”朱自治因为遍尝美食而为保护传统美食文化作出了“歪打正着”的贡献这一具有强烈反讽意味的主题时,他也就在无意间流露出了“美食家有时比浪漫主义者更聪明”这一颇有世俗化意味的思想倾向。谈及自己的文化品格,陆文夫说过:“我们这一代人太过忧国忧民,一看到现实社会有什么问题,就在作品中反映……其实我对苏州各式各样的民间行业很熟悉,也很有兴趣……我也想向民俗这方面发展,写出真正的文学。”^⑥这段话表明,作家在写了许多“忧国忧民”的作品(包括《小贩世家》、《井》、《围墙》那样针砭“国民性”的名篇)的同时也很想写出苏州的“民俗美”来,并

认为写“民俗美”才是“真正的文学”。对于陆文夫本人,从“忧国忧民”到写“民俗”,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美食家》之后,作家终于没能写出“民俗”的新篇,而是继续沿着“忧国忧民”的老路子写了下去,其中的奥秘,值得探讨);对于以陆文夫为代表的那一代作家,这转折也透露出世俗文化对于在“革命文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的影响在渐渐增大的信息。

在“寻根文学”中^⑦,李杭育从那些渔佬儿、山民的身上发现了吴越古风的流韵,“吴越的幽默、风骚、游戏鬼神和性意识的开放、坦荡”^⑧使他们活得自在、浪漫。在《珊瑚沙的弄潮儿》中,进了城、做了官的康达变成了“没有性格”的“面团儿一块”,倒是在葛川江上弄了一辈子潮的老头保持了勇敢、快活的健全个性。作家有意让康达在老头的弄潮壮举前自愧弗如,也就表达了“高贵者羡慕弄潮儿”的主题。郑万隆在《我的光》中让进山考察的纪教授从鄂伦春老猎人库巴图那儿感受到了古老的神话、传说、万物有灵信仰的神奇魅力,实际上也就写出了猎人引导着教授进入“一个非常深广的世界”的主题。这种“高贵者羡慕弄潮儿”、“俗人引导教授”的主题足以使我们联想到“改革家文学”中“改革家从普通人那儿汲取智慧”、“改革家羡慕普通人的生活”的主题。这些主题中,浸透了当代作家在民间生活中获得的民本主义情感,体现了他们试图从世俗的活法、世俗的人生智慧中汲取消除极左思潮影响的力量的理性精神。而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以自己的创作证明了世俗人生智慧对于当代人文精神建构的必要。显然,世俗人生智慧作为千百年来维系了广大平民百姓生存信念的一种文化观,体现了与政治家的权谋、知识分子的学理迥然有别的民间价值体系,组成了多元文化格局中不可忽略的一元。

无论是那些白描的“民俗画”,还是那些

深沉的“反思篇”，也不管是那份老老实实做人的平常心，还是那种我行我素、“以柔克刚”的执着品格，都体现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气质：奋发、开朗、上下求索。虽然80年代初也已经出现了路遥的《人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那样一些刻画世俗人生的痛苦与无奈的作品，但总的看来，与前面所述的那些格调温馨、豁达、开朗、浪漫的礼赞世俗人生的作品相比，这些作品似乎还没有形成如80年代末的“新写实”那样的强大声势。80年代初意气风发的精神气氛给那个年代的世俗化作品也普遍涂上了一层鲜明的亮色。尽管当时的文学主流是反思历史、重塑民魂、呼唤人道主义的回归，甚至那些描写世俗人生的作家们也未必都意识到自己创作中的世俗文化气息所具有的深刻意味：他们的作品正在渐渐远离崇高和沉重，正在悄悄回归世俗生活，回归被政治运动扰乱了的、为绝大多数人所喜爱的世俗生活。

80年代末至90年代： 世俗化思潮的演变历程

在评论界常常提到的“新写实”作家中^①，至少方方、池莉、余华都曾在80年代初写出过格调或明朗、或缠绵的作品（如方方的《“大篷车”上》、池莉的《月儿好》、余华的《星星》等）。但她（他）们却不约而同地在1987至1988年间迅速完成了从发现人生的明朗、温馨、忧伤到暴露人生的阴暗、冷漠的转变——《风景》、《烦恼人生》、《十八岁出门远行》这些“新写实”的名作的竞相问世，也许纯属偶然。但联想到刘恒、刘震云、苏童、叶兆言在那几年的创作中也纷纷写出了他们无情展示人生的污秽与残忍的“新写实”作品，就不能不使人感受到时代精神在几年间就完成了令人惊叹的巨变的气息。从《伏羲伏羲》中的

乱伦悲剧到《一地鸡毛》中的琐碎烦恼，从《妻妾成群》中渲染女人的勾心斗角到《枣树的故事》中写女人的麻木心灵……“新写实”作家们将世俗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无遗。当代文坛上的审丑、溢恶之风到了“新写实”这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新写实”思潮的发生显然与当代作家对“新潮文学”的反思有关。一方面，“新潮文学”解放了作家的想象力，促成了文学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功不可没。另一方面，评论界对“伪现代派”的讨论也具有深刻的意义：中国作家跟在西方“现代派”的后面跑，到底有多大的意义^②？在中国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现实的制约下产生出来的“新潮文学”与西方的“现代派”文艺之间，究竟有多少相似之处^③？这样的讨论与当代文坛上的许多争论一样，因为众说纷纭而不可能达到一致的结论，但是，其中体现出的本土文化意识和现实品格，却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而“新写实”作家叶兆言则在《最后的小小说》这篇创作谈中大胆宣告了“现代派”的终结：“新的配方也许永远产生不了。……小说的实验室很可能就是小说最后的坟墓。”^④他的这一番议论与西方多年前就流行的有关“小说死亡”的议论一脉相通^⑤。因此，他将自己的创作定位于“重新获得读者”。“现代派”的探索有涨潮就会有落潮。在1985至1986年间的“新潮文学”高涨过后，写实的文学再度兴起，体现了文学多元思潮互动的辩证法。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余华有意继承了“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⑥；刘恒的创作深深打上了弗洛伊德的烙印（他的《伏羲伏羲》、《虚证》、《黑的雪》、《逍遥颂》、《苍河白日梦》、《冬之门》都带有鲜明的精神分析色彩，其中，《黑的雪》有一副题：“一部探索性的精神分析长篇小说”）；苏童从塞林格和福克纳那里汲取了灵感^⑦；叶兆言的《死水》塑造了一个“局外人”的形象；

《五月的黄昏》、《挽歌》也是以“局外人”的口吻写成；而《去影》中则涌动着精神分析的激情……综观这些现象，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观念已经深深融入了“新写实”作家的人生观与文学创作中。那种荒诞感、绝望感，成为了“新写实”小说的基本主题。“新写实”与“现代派”的根本区别仅仅在于：“现代派”文学以变形、夸张、象征和语言试验为特色，而“新写实”则擅长展示“原生态”的丑恶、琐碎、无聊、无奈。在精神实质上，两股思潮其实都是世纪末情绪的体现。

这样，“新写实”看似“新潮文学”的反拨（这种反拨主要体现在创作手法的层面上），其实又是“新潮文学”的某种延伸（精神气质上的延伸）。由此可见，西方“现代派”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新写实”的重要思想资源。在这种思想、情绪的驱使下，“新写实”作家暴露了世俗人生的阴暗面。

不止于此。“新写实”在80年代后期的高涨，还有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80年代中，伴随着社会转型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通货膨胀引起的情绪波动、“官倒”激发的社会不满、“全民经商”掀起的浮躁大潮、“体脑倒挂”导致的心理失衡、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触发的一片叹息……这一切，都改变了当代人的价值观。这种无奈的情绪正好为“新写实”作家的“冷漠化”创作铺垫了社会心理的基础。对此，评论家王干作过恰当的描述：“新写实”是对“世俗生活的一种认同”，“是对个性主义的一个反动……‘自我实现’的情绪整个没有了，承认现实，悟透了，无可奈何”。在“新写实”作品中，“语言也世俗化了，非个性化了”^⑩。面对无尽的烦恼，面对司空见惯的悲剧，“新写实”作家“没有惊讶，缺少感慨万端的情绪”，至多不过是“骨子里（却）渗透了对人世的哀伤”^⑪。——这种近乎麻木的心理状态与批判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激情相去甚远。

应该指出的是，“新写实”作家的创作风格也不是一律“冷漠”。方方常常在创作谈中谴责生长丑恶的“土壤”^⑫，她的一部分创作（尤其是《黑洞》、《祖父在父亲心中》、《一波三折》等篇）因此而显示出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相通；池莉的“过日子”小说常常在描写了人生的烦恼的同时努力发掘“我们普通人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坚韧的生活力量”，表达“我们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将竭尽全力去做”这样“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⑬，温馨之意，一目了然，也使人不禁联想到孔捷生的《普通女工》、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的主题。尽管如此，在余华、刘恒、刘震云、苏童、叶兆言的作品中，“冷漠”（例如刘恒、苏童、叶兆言的风格）、“冷酷”（例如余华的风格）、“冷嘲”（例如刘震云的“官场小说”和“故乡系列”）仍然是“新写实”最突出的色调，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当“新写实”的作家们不约而同地以冷漠、冷酷、冷嘲的眼光去打量世事时，他们也就在解构世俗人生的诗意的同时，为世纪末情绪的进一步弥漫开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朔热”的兴起也是在80年代后期，与“新写实”小说的兴起同时。虽然也有论家将王朔划入“新写实”之列（例如王蒙^⑭），但王朔作品中的“痞子气”（在世俗生活中得乐且乐，玩世不恭）与“新写实”小说中的压抑氛围、冷漠色调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王朔在一篇创作谈中写道：他的“写作动机萌动于世俗生活的刺激”。他不喜欢“现代派”，但认同海明威、雷马克，因为“他们的作品中尽管更多的是描写灾难、绝望和空虚，但同时作品中的人物保持了一种健康的身心状态，没有知识分子的病态心理和萎靡偏执。不论多么险恶的环境和龌龊的人际关系，总有一种动人心弦的温情”^⑮。——对“健康的身心状态”和“动人心弦的温情”的追求是王朔区别于“新写实”诸家的重要特质所在。不过，由于王朔

笔下的主人公多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痞子”，所以那“健康的身心状态”和“动人心弦的温情”明显不同于《普通女工》、《69届初中生》中主人公的“认真”活法。这里，我们不难感受到世俗“温情”的不同境界：一种人在享乐中寻找“温情”，另一种人则在平凡中固守着“温情”。

浮躁、冷漠的世纪末情绪没有、也不可能吞没真诚、温馨的世俗情感。事实上，就在“新写实”风头正健之时，另一批作家继续在发掘着世俗化的诗意——

例如张欣。她的《爱又如何》、《掘金时代》都描绘了“全民经商”大潮的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描绘了人在世道浇漓、人心不古时代的随波逐流、载浮载沉。不过，《岁月无敌》中的方佩不是就在激励女儿“下海”弄潮的同时也努力给女儿灌输着“保持心理健康非常重要”、“锻炼自己抗拒诱惑的能力，坚持诚实正直的能力，不模仿别人的能力”的做人之道么？这样的主题与《普通女工》、《69届初中生》的主题一脉相承。时代变了，可人心不一定会变。张欣努力在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高涨的生存环境中保持一种既拒绝冷漠、也拒绝玩世不恭的姿态，她说：“我实在是一个深陷红尘的人，觉得龙虾好吃，汽车方便，情人节收到鲜花便沾沾自喜；当然我也对沦落街头的人深表同情，对失学儿童捐款热心，痛惜妙龄女郎因物欲所惑委身大款”，生活在广州的她直言：“广州实在是一个不严肃的都市，它更多化解了我的沉重和一本正经。”尽管如此，她仍然“在写作中总难舍最后一点点温馨，最后一点点浪漫”^②。

又如王安忆。在90年代，她进一步认同了苏青：“苏青是有一颗上海心的”，“晓得做人是没意思的，就挑那些有意思的去做，晓得人是有限的，就在有限的范围里转，晓得左右他人没有可能，就左右自己吧！都是认清现实，也都是妥协，张爱玲是绝望的，苏青却不

肯”，她“在没意义中找意义”。“理想和沉沦都是谈不上的”。“这城市能撑持到现在……都是靠苏青的精神挺过来的”^③。在《长恨歌》中，作家告诉读者：“上海的市民，都是把人生往小处做的。对于政治，都是边缘人。”“在那个严重匮乏生活情趣的年头里，她们只需小小一点材料，便可使之焕发出光彩。”“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上半叶，你到淮海路来走一遭，便能感受到在那虚伪空洞的政治生活底下的一颗活泼跳跃的心。”作家对上海城市精神的这些描述不仅进一步深化了《69届初中生》、《流逝》中的人生思考，还具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意义，更表达了作家对上海百年沧桑历史的哲理思考：当“沪上淑媛”王琦瑶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里以务实的人生态度坚韧营造出自己的小天地时，她不可能想到，当政治运动随风而逝之后，她所固守的生活方式（远离政治，追求实惠，自在逍遥）会再度成为时代的主潮。

与王安忆的思考异曲同工的，是90年代初“新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刘玉堂。在《温暖的冬天》、《温柔之乡》、《人走形势》这些作品中，作家传神地写活了五六十年代农民的生存状态——他们一面应付着政治形势的多变，一面按照自己的朴素情感、风俗习惯、灵活心计生活，以古朴的人情去化解政治的无情，以健康的心理去调节艰难的生活。刘玉堂的小说很容易使人联想到80年代初谌容的小说《太子村的秘密》、张贤亮的小说《河的儿子》。那些写农村基层干部以中国农民的精明、狡黠与极左政策周旋的小说也是世俗化生活态度足以消解政治狂热的证明。

然而，王安忆、刘玉堂那样的作品毕竟没有产生出像“新写实”、王朔的作品那么巨大的反响。其中的原因值得研究。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新写实”的审丑、溢恶倾向和王朔小说中的玩世不恭情绪更对90年代人的口味。9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边缘化”的

感慨和“后现代主义”关于“平面化”的议论在无形中淡化了思想(包括文学作品中的反思倾向)的基础。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人们更需要的是感觉,而不是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新写实”在尽情宣泄了审丑、溢恶的冷漠情绪以后,也渐渐发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余华在90年代的创作中逐渐告别了冷酷的风格,《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基调虽然还散发着寒气,但小说的主题已经由展示人生的残酷转向静观人生的麻木与豁达。还有刘恒,不是也在90年代末写出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吗?在谈及这篇小说的主题时,刘恒指出:“张大民的可爱之处”在于“知足长乐”,他的“幸福”是“不幸中的幸福”。“在生活中不幸是绝对的,幸福是相对的。任何人的任何角度都能看到不同的幸福与不幸,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幸福与物质幸福”,“能否得到精神幸福很大程度上也就取决于自己的个性”²⁴。这样,《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贫民张大嘴的幸福生活》就与当年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一起成了当代作家理解(而不是批判)下层平民“活着”的人生状态的证明。“好死不如赖活着”,是许多中国普通百姓的人生信念。在这样的信念中,积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崇拜情感,也显示了平民百姓在饱经磨难中形成的特殊体验,——消极地看,是“逆来顺受”、“麻木不仁”的国民劣根性,但其中也不是没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坚忍与豁达。当年,鲁迅在《阿Q正传》中针砭了阿Q的蒙昧、麻木、自欺欺人,呼唤“改造国民性”。但当代作家还是在《陈奂生上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深刻揭示了“精神胜利法”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对于那些长期在社会的底层被无情的命运播弄的小人物来说,忍从、自我调节和苦中作乐、知足长乐,是最切实可行的生存通道²⁵。——当余华、刘恒表达了对贫民生活的这一层理解时,他们也就超越了

绝望的虚无主义情绪,而与他们以前的“新写实”作品(例如《现实一种》、《虚证》等)中的绝望主题区别开来。在这样的风格转变的后面,我们不难感受到作家不断超越自我的努力。同时,还可以将这种转变看作90年代精神氛围的一个缩影:经历过80年代后期的浮躁以后,90年代的人们对现实有了更平和、更务实的理解。

“新写实”的浪潮在渐渐退去。王朔的小说创作也给人以江郎才尽的感觉(出版于90年代末的《看上去很美》尽管“炒”得很热,但成就明显不如他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作品)。但王朔作品中的狂欢气息却在一批文坛新人的作品中得到了延续。在卫慧、棉棉的作品中,我们目睹了当代“新人类”的生存状态。在当代的繁华大都市里,那些“愤怒青年”在追求感官的快乐中打发着时间。卫慧在《像卫慧一样疯狂》中写道:“所谓的幸福不也就是对痛苦烦恼的遗忘吗?要的就是这种遗忘。”“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酒吧、流行音乐、现代艺术、白日梦、性解放、时装……这一切构成了消费社会中的“新人类”忘却烦恼的法宝。“游戏人生”,“找乐”,本来就是世俗生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乐以忘忧,中国人早就发明了种种的游戏:品酒、品茶、纸牌、麻将、象棋、围棋、斗鸡、斗蛐蛐、养花、养金鱼,以及种种自娱自乐的吹拉弹唱,这些游戏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冲淡烦恼、调剂心态、装点人生的巨大作用,构成了市井文化的主体。到了现代社会,又有了西方娱乐方式的引入:咖啡、流行音乐、舞会、电影、电视、网球……这些娱乐方式在丰富了中国人

的文娱生活的同时,正在成为“新人类”生活的主要部分。早在80年代末,一曲《跟着感觉走》的流行歌就唱出了“文革”后出生的一代人个性解放、自由自在的生活渴望。对于他们,“没有什么最高原则。最高原则就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这么回事。”“他们什么都要尝一尝。”^②到了90年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为“跟着感觉走”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因此,才有了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这样描写“新人类”尽情享乐、乐以忘忧到了惊世骇俗程度的小说。

“新写实”是冷漠的极端。“新人类”小说是狂欢的极端。但“新写实”的审丑溢恶倾向和“新人类”的纵欲狂欢倾向都是鄙俗化倾向的表现。无论它们作为时代情绪的体现具有怎样的认识价值或思想意义(它们毕竟是这个世纪末浮躁、绝望情绪的产物),由于远离了审美的原则和人道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念,它们必然在精神气质上显得鄙俗不堪。另一方面,从“新写实”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风靡一时到“新人类”作品在世纪之交的走红,我们不难窥见世纪末世俗化思潮演变的某些轨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转变,从冷漠转向狂欢的演变。冷漠使人绝望。狂欢也不能使人的灵魂得救。事实上,在这个无情的世纪末,有多少青少年因为“跟着感觉走”而误入了人生的歧途!

世俗化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世俗化的潮流本身又会因为种种政治、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作用而分化出不同的人生与艺术境界:有认真的世俗化,也有玩世不恭的世俗化;有冷漠、麻木的世俗化,也有疯狂纵欲的世俗化。应该说,世俗化潮流本身的不断分化也是人生丰富多变、文化多元互动的具体体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随着世俗化思潮在当代中国的不断发展,当代小说中的世俗化倾向却呈现出从明朗演变为阴暗、从朴实演变为鄙俗的趋向。尽管在90年

代,张欣、王安忆的“都市小说”和刘玉堂的“新乡土小说”依然展示了明朗的格调、认真的主题,但“新写实”的阴暗、冷漠色调、“王朔热”的玩世不恭气质和“新人类”小说的鄙俗主题的此起彼伏、风云际会(它们在社会上的影响显然超过了那些格调明朗的故事),仍然显示了文学和人心在向着鄙俗化的方向狂奔的动向。这是社会与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吗?恐怕不然。在当代世界文坛上,鄙俗化潮流似乎从未成为现代化国家的文学主流。如果说,鄙俗化思潮在80年代末以后渐渐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坛的主流(这种倾向终于在1993年激起了评论界、知识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但这种讨论的影响也只能限于评论界和知识界),那么,这一文学现象除了表明我们民族的精神与文学危机以外,还能说明什么?

撇开各种文学“新潮”给世人带来的新鲜感觉及其文学价值不谈,我们从“长时段”角度观察二十年来文学世俗化思潮的流变过程,结论不能不是令人忧虑的。朴素、温馨的诗意为什么离我们的生活和文学越来越远?而如果世俗化的结果是这般的无奈,那么,超越鄙俗化的可能性和现实出路又在哪里?

① 参见[法]米歇尔·伏维尔:《历史学和长时段》一文, J·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孙中山就指出:“……现在中国来提倡自由,人民向来没有受过这种痛苦,当然不理睬,如果在中国来提倡发财,人民一定是很欢迎的,我们的三民主义,便是很像发财主义。……俄国革命之初,实行共产,是和发财相近的。”(《民权主义第二讲》,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3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 参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第86页,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

④ 《〈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从文自传》第121、

1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⑤⑥见施叔青:《陆文夫的心中园林》,《人民文学》1988年第3期。

⑦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阿城也是“寻根派”中人。但他笔下的主人公多为知青,他因此与主要写渔民、猎人生活的李杭育、郑万隆有所不同。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有意将阿城划入了“知青文学”。其实,“寻根派”的主力是知青出身的作家——韩少功、李杭育、郑义、阿城都当过知青。只郑万隆、莫言例外。

⑧《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

⑨按照“新写实”写世俗人生的“原生态”这一基本特征来划,王安忆的《好妈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铁凝的《棉花垛》、《玫瑰门》其实也都是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新写实”小说,但不知为什么,评论家在谈论“新写实”时,常常不提她们的上述作品。

⑩参见李陀:《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4期。

⑪参见季红真:《中国近年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艺报》1988年1月2日、9日。

⑫见《中篇小说选刊》1988年第4期。

⑬参见米兰·昆德拉的《被忽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一文(收入《小说的艺术》一书,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章国锋的《文艺的衰亡》一文(见《世界文学》1994年第1期)。当代中国作家中认同此论者,还有一身而兼“新潮小说”作家和“寻根文学”作家的韩少功。他在《灵魂的声音》一文中写道:“小说似乎在逐渐死亡”。“小说更大的苦恼是怎么写也多是重复……小说的真理是不是已经穷尽?”见《小说界》1992年第1期。

⑭参见余华《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一文,《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⑮参见林舟:《永远的寻找——苏童访谈录》,《花城》1996年第1期。

⑯王干等《新写实小说的位置》(对话录),《上海文学》1990年第4期。

⑰刘恒《断魂枪》,《小说选刊》1988年第11期。

⑱参见《仅谈七哥》,《中篇小说选刊》1988年第5期;《总是乱发感慨》,《中篇小说选刊》1993年第1期。

⑲也算一封回信》,《中篇小说选刊》1988年第4期。

⑳王蒙剖析“新写实主义”》,《报刊文摘》1992年12月15日。

㉑欣赏与摈斥》,《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㉒深陷红尘,重拾浪漫》,《小说月报》1995年第5期。

㉓寻找苏青》,《上海文学》1995年第9期。

㉔敢问张大民幸福在哪里》,《北京青年报》2000年3月1日。

㉕又岂止于贫民百姓?经济学家于光远也在《文革中的我》一书中回忆了自己在“文革”中靠“革命的阿Q主义”度过难关的经验:“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处于顺境,顺境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逆境可以锻炼自己的意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页。

㉖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董之林